

德國近代史的奠基

——蘭克《普魯士史》導論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周惠民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生平

蘭克於 1795 年 12 月 21 日出生在德國圖林恩 (Thuringen) 烏恩斯特魯特 (Unstrut) 城附近的小鎮威和 (Wiehe)。圖林恩因位居德國地理的中心，自然成爲一個商旅交會、文化接觸的地帶，在歷史上也常成爲兵家爭勝，折衝尊俎之地。該地原本是奧圖王室 (die Ottonen)¹ 所控制的土地，奧圖王室衰落之後，各方政治勢力競相角逐，主權經常易主，也常發生重大衝突。1517 年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發動對教會的批評，就是從圖林恩開始，傳播到各地。此後，該地區的宗教信仰便以路德派爲主²。

蘭克的父親是一位路德派的神職人員—使其自小接受宗教薰陶，成爲一名虔誠的路德教派信徒³。蘭克亦接受古典文學的訓練，對歷史有極大的興趣，他日後撰寫教會歷史，應當與這樣的生長環境有關。蘭克先後在萊比錫 (Leipzig) 大學與哈勒 (Halle) 大學讀神學與哲學，1818 年畢業之後，在奧德河畔的法蘭克福任古文中學教師，教授歷史等課程，也開始從事歷史研究及寫作，尤其對 16 世紀及 17 世紀史用功甚勤，其著作之主題亦集中於這個時期⁴。

1824 年，蘭克完成了第一本歷史著作《1494 年到 1514 年間羅馬與日耳曼民族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⁵，在本書中，他使用的方法與當時一般學者稍有不同，除了大量使用回憶錄、日記、書信、外交文書之外，也運用了許多「目擊者」所記載的第一手敘述，並將許多語言學的方法應用到歷史研究，頗獲好評。於 1825 年起，獲邀到柏林大學擔任「非常任教授」之職

- 1 奧圖王室爲 10 世紀到 11 世紀間德意志地區的統治家族，得名於奧圖一世 (912-973, 936 年繼位)，三傳至亨利二世 (972-1024)，死後無嗣。這段期間中，文藝學術發展均有可觀，稱爲奧圖王室的文藝復興。
- 2 今日的圖林恩地區原本信奉羅馬公教，馬丁路德的抗議運動之後，除了少數地區外，多改信路德教派。2004 年底的統計顯示：該區尚保持積極信仰者中，路德教派約佔 26.1% (全區總人口)，羅馬公教派約佔 8.1%。
- 3 兩個弟弟漢利希與恩司特 (Friedrich Heinrich Ranke, 1798-1876; Ernst Ranke, 1814-1888) 都是神學家。
- 4 主要著作包括：
 - Die Osmanen und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 Die Römischen Päpste, ihre Kirche und ihr Staat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 Neun Bücher preußischer Geschichte*
 - Französische Geschichte, vornehmlich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 Englische Geschichte, vornehmlich im 17. Jahrhundert*
- 5 羅馬民族爲德意志概念，指使用羅馬語系的民族，在英文中習稱爲拉丁語系，故本書的英文翻譯爲《1494 年到 1514 年間拉丁與條頓民族史》(*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from 1494 to 1514*)。

(a. o. Professor)⁶，1827 年出版了《16、17 世紀間南歐貴族與民族史》(*Fürsten und Völker von Süd-Europa im sechzehnten und siebzehnten Jahrhundert*)⁷。1827 年到 1831 年間，他前往維也納及義大利各地旅行、研究，蒐集各種教會史的文獻，並在日後完成《4 世紀以來的羅馬教宗》(*Die römischen Päpste in den letzten vier Jahrhunderten*)⁸。從義大利回到柏林之後，他開始發行一個名為《歷史政治期刊》(*Historisch-politische Zeitschrift*) 的刊物，一共發行四年，後輯為兩冊出版。他在這個刊物中也經常發表文章，其中有部分言論並不支持 1830 年的七月革命，因此在政治上被列為保守派。1834 年，他獲柏林大學聘為正教授 (ord. Professor)，並於 1841 年起兼任普魯士國家宮廷史官 (Historiograph des Preußischen Staates)。

蘭克於 1843 與葛瑞芙 (Helena Clarissa Graves, 1808-1871) 結婚，葛瑞芙女士出身英格蘭世家，父親曾任都柏林警察總監，兩人育有三子一女。

1852 年到 1861 年間，蘭克完成並出版了《16、17 世紀法國史》(*Französische Geschichte, vornehmlich im sechzehnten und siebzehnten Jahrhundert*)，又於 1859 年到 1869 年間又完成了《16、17 世紀英國史》(*Englische Geschichte, vornehmlich im sechzehnten und siebzehnten Jahrhundert*)。蘭克除了將精力放在政治史的研究之外，也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史料分析及驗證方法，成為現代史學的濫觴，普魯士為了表彰他對普魯士及德意志文化的貢獻，將他封為貴族。

1871 年德意志帝國成立時，蘭克已經 76 歲，逐漸從政治及學術場合中淡出，將主要精力放在編定自己的《全集》(*Sämtliche Werke*) 之上，並陸續出版了相當具有政治意味的《德意志諸邦與諸侯同盟》(*Die deutschen Mächte und der Fürstenbund*)、《革命戰爭的起源與開展》(*Ursprung und Beginn der Revolutionskriege 1791 und 1792*)，(1875 年出版)、《哈登堡與 1793 年到 1813 年間普魯士史》(*Hardenberg und die Geschichte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von 1793 bis 1813*)，(1877 年出版) 等書。1875 年起，更以口述的方式，撰寫《世界史》(*Weltgeschichte*)，但這本書到他去世時仍未完成。1886 年 5 月 23 日，蘭克在柏林去世，葬在索菲雅公墓 (Sophien cemetery)，至今仍存。他的藏書則搬到紐約的塞拉庫斯 (Syracuse) 大學。

史學

一般人認為：蘭克是現代史學理論的奠基者、開拓者，但蘭克的思想也受到他所處環境的影響與限制。如果要研究蘭克史學思想的根源，必須回到蘭克所處的社會，

6 此處德文名稱為 Ausserordentlicher Professor，指具有教授資格，但並無實缺的人員，可以在大學授課，但並無正式職務及薪水，1834 年才獲得正式教授職位。

7 英譯為 *The Princes and Peoples of Southern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8 英譯為 *The Roman Popes in the Last Four Centur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才容易瞭解。19 世紀中期是德意志地區大學學術 (Universitätswissenschaft) 發展極為迅速的時期。物理學、病理學及地理學等均有重大突破，亞歷山大·鴻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⁹ 的五大冊鉅製《宇宙》(Kosmos) 是典型的代表。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史家蘭克在建立其史學理論時，也主張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認為史學的目的不在於教育與指導，而是以敘述過去為主要職志。蘭克認為，「單純指出過去的面貌」(bloß zeigen, was eigentlich gewesen ist)，這個目標必須透過廣泛且深入的研究史料方能達成。蘭克這種歷史研究法也非獨創，而是 18 世紀以來許多學者共同強調的歷史研究法：以檔案為依歸。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 撰寫《尼德蘭脫離西班牙統治史》(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 時即認為：「每當我想到我不能如願，將這本內容豐富的著作完全根據我對檔案及時人文件的研究撰寫，擺脫前人的拘束，免於重蹈前人對讀者的限制，心中就有許多難過¹⁰。」這種強調檔案及一手資料的研究 (aus ihren ersten Quellen und gleichzeitigen Dokumenten zu studieren)，與日後蘭克所主張的方法並無二致。

蘭克也強調語言學對歷史研究的重要，由於蘭克本身對語言學有深厚的造詣，故而十分強調語言學對內部批評與外部批評的重要，這與鴻堡 (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 的作法相當接近。鴻堡在 1821 年曾經出版《論歷史寫作者的任務》(Ü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schreibers)，討論歷史研究法及歷史對人類文明發展的意義等重要內容，又於 1828 年出版《論南海島嶼語言》(Über die Sprache der Südseeinseln) 及《論人類語言結構之差異及其對不同性別精神發展的影響》(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s und sein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1836 年出版)。鴻堡認為可以從語言結構解釋文明間的差異，對蘭克主張從語言學研究歷史有很大影響。這種「歷史與語言研究的結合¹¹」一直是柏林地區重要的學術傳統及特色，我國早期前往柏林求學的學者也深受其影響，陳寅恪、傅斯年均為此學派的重要發揚者。

但蘭克對社會史或社會觀點的歷史詮釋並無興趣，蘭克著作的主要內容為政治與國家的歷史，其著作中出現的角色都與政治有關。他的研究也以政治世界為主軸，而不觸及社會觀點或社會底層人民的相關議題。唯一與農民有關的主題是「農民戰爭」，只因為農民戰爭受到馬丁路德的影響，而且是德意志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才不得不述及。

9 為柏林鴻堡大學創辦人鴻堡 (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之弟。

10 Friedrich Schiller, "Vorrede der ersten Ausgabe" in: *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 (1788).

11 中央研究院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亦是受此種風氣之影響。

根據易格斯 (Georg Iggers) 的說法，19 世紀德意志史學中歷史中心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開始以政治史研究取代過去的文化史及宗教史，將檔案、文獻作為歷史研究的重要內容¹²。這種主張，亦非蘭克所獨創，而是從 18 世紀以降的歷史研究主流。席勒已經念茲在茲地希望「讓檔案說話」，達爾曼 (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 1785-1860) 也編輯相關檔案以撰寫德意志史¹³。

《普魯士史十二書》

《普魯士史十二書》(*Zwölf Bücher Preußischer Geschichte*) 是蘭克諸多學術著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套書，書中除了宣達其政治理念及歷史觀之外，本書的寫作也成了近代歷史學的一個里程碑，使用各種新的研究方法，採用大量的檔案文獻；而書序中一句話：「只要說明究竟發生了什麼事」(bolss zeigen, was eigentlich gewesen ist)，也成了蘭克之後許多歷史學者的座右銘。

普魯士是德意志民族中位於東北方的一個重要勢力，國家的建立雖在於布蘭登堡選侯的基礎上，但實際的起源卻因為經由十字軍活動而起的「武士團政府」¹⁴。1226 年以後，武士團建立的政權才歸屬於史陶芬 (die Staufer) 王室。蘭克在《普魯士史十二書》中先以較大的篇幅討論阿斯坎家族 (Askanier) 時期 (1134-1320)、威特司巴赫 (Wittelsbacher) 及盧森堡 (Luxemburger) 王室時期 (1323-1412) 的普魯士，再進一步討論霍恩索倫 (Hohenzollern) 王室時期的發展，從霍恩索倫以下，因資料較為完整，敘述也較為詳盡。

蘭克為路德教派信徒，他的宗教信仰也明顯表現在其寫作之中，例如他對布蘭登堡的君主尤阿信二世 (Joachim II, 1505-1571) 統治時期 (1535-1571) 有關「宗教改革」(Reformation) 的態度便極為讚揚，指出：「普魯士是宗教改革運動的母國，在這裡，抗議教派的思想發展成政治的動力；我很高興在普魯士歷史發展及後半段宗教改革運動史中，看到這樣的動力。」¹⁵

《普魯士史十二書》中的第七書到第十二書的主要內容，為菲特烈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 1740 年繼位) 時代，但止於 1756 年。

12 見：Geor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 of History*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 達爾曼為 19 世紀初德意志重要政治家、歷史學者，長期在哥廷根大學 (Göttingen) 任教，是德意志浪漫運動中著名的「哥廷根七子」(die Göttinger Sieben)，也是法蘭克福大會代表之一，制憲的起草人。他的學術著作包括了《德意志史料研究》(*Quellenkund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für eigene Vorträg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geordnet*) (Göttingen 1830; 5. Aufl., hrsg. von Waitz, 1883).

14 12 世紀起，德意志地區的武士團如條頓武士團 (die Teutonen) 也計畫向東擴張，傳布公教，並在東歐地區建立據點，成為地方政治勢力，也有部分據點因奉獻教會，成為教會邦，東普魯士地區亦有這樣的組織。馬丁路德與教會分裂後，部分武士團政府遂改由世俗君主繼承，東普魯士後由布蘭登堡繼承，成為日後普魯士得名之源頭。

15 Leopold von Ranke, *Ausgewählt und bearbeitet von Hans-Joachim Schöps, Preußische Geschichte, 1415-1871* (Mühlthal: VWA.-Techow Verlag, 1981), p. 15.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到了1871年，蘭克又出版一本《七年戰爭的起源》(*Der Ursprung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實際上也就是《普魯士史十二書》的第十三本。稍後，蘭克又寫了一本小冊子《七年戰爭之我觀》(*Ansicht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作為補充。1875年後，又繼續出版《1780年到1790年間的德意志史—德意志列強與「諸侯同盟」》(*Die Deutschen Mächte und der Fürstenbund: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1780-1790*)¹⁶，補足《普魯士史十二書》中未討論的部分。在這些敘述中，蘭克的看法容或與現代史家有些不同，但都表現出其所處時代背景及作者的信念。例如現代史家認為「諸侯同盟」是一個歷史上的偶然組合，只為了滿足當時政局的需求，但蘭克認為這是菲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 1744-1797, 1786年繼位)的精心設計，與日後的德意志帝國有相當關連。

在本書的方法論上，蘭克首先將「敘述的歷史」(die erzählende Geschichte)與「新的知識基準」(die neuen wissenschaftlichen Grundlagen)結合，企圖在「還原歷史」(die Wiedergabe der Geschichte)時，儘量做到「客觀」(die möglichste Objektivität)，進一步發展成為「專業的歷史研究」(Professionalisierung im Geschichtsstudium)。據蘭克的說法，所謂的「專業歷史」有別於當時社會對歷史的期待：「社會賦予歷史學者這樣的責任：整理過去，以供現世利用，並提供未來者一些教訓。」¹⁷ 蘭克在本書的序言中指出：「我的作品中，卻沒有這樣大的功能，我的作品只要說明究竟發生了什麼事。」¹⁸

儘管標榜「客觀、專業」，歷史仍是為特定的目的而服務，在蘭克的史學中，「普魯士中心論」就是一個重要的目的。19世紀中期以後，德意志境內有許多人主張以普魯士為中心，領導德意志各邦建立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這原本是一個政治路線，但也影響了人文學科領域的發展，形成學術界的重要流派：「普魯士中心論」，希望建立普魯士在德意志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領導地位，甚至以普魯士史為德意志史的發展中心。除了達爾曼及德羅伊森(Gustav Droysen, 1808-1884)¹⁹等人外，蘭克也是這種理論的支持者。他從神聖羅馬帝國與教宗及其他列強的互動中得到結論：德意志之統一只有在君主體制下才能完成，而能達成此目標者又以普魯士之君主為不二人選。

這種具有政治目的的歷史論述，清楚表現在《普魯士史十二書》之中。在本書的

16 1785年，普魯士與漢諾威及薩克森結成三選侯同盟(Drei-Kurfürstenbund)，之後有其他14個德意志諸侯國加入，擴大為「諸侯同盟」(Fürstenbund)。除了路德教派君主外，還有曼因茲的主教邦(Erbischof und Kurfürst von Mainz)參與，主要目的為保護帝國憲法，尊重列國現狀。菲特烈將之作為對抗哈布斯堡勢力的工具。1788年，普魯士宣布退出該同盟，1790年，同盟瓦解。

17 Leopold von Ranke, Ausgewählt und bearbeitet von Hans-Joachim Schöps, *Preußische Geschichte, 1415-1871*, p. 9.

18 Leopold von Ranke, Ausgewählt und bearbeitet von Hans-Joachim Schöps, *Preußische Geschichte, 1415-1871*, p. 9.

19 特羅伊森原為高中教師，1840年以後擔任基爾(Kiel)大學教授，研究領域為上古史，因德意志統一問題，使其參與政治，並支持普魯士領導德意志人民爭取統一，研究領域也轉到當代史。

序言中他說：「除了各方的要求以外，由於過去幾年所發生的事件，讓我起意，更仔細的說明現今對歐洲及整個世界變動扮演極重要角色的布蘭登堡——普魯士的發展起源；並對其何以能躋身歐洲列強的發展加以討論。

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先將標的的性質說明清楚。普魯士的國家基礎並非來自於古老的力量，而是一個逐漸上升的主權國家。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他是一步一步建設而成。」²⁰

依據這樣的設計，蘭克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應當以歷史為依據，而歷史寫作或記載應當服從於政治。這一點或與當時許多學者的想法有些不同。浪漫時期許多人認為絕對的真理並不存在，在研究方法上，與自然科學者所採取的方法自然有別。而歷史學者開始去尋求新的方法，希望更接近真理，蘭克的史學方法，就是其中比較重要的發展。

蘭克歷史觀的另一個重點，是他並不認同「歷史哲學」這樣的想法。他認為每一個時代有其特殊的風尚，寫作歷史時，必須將這種風尚清楚交代，但風尚並不能夠簡化成一個概念，也沒有所謂「歷史哲學」。這一點恐怕是他與黑格爾等人最大的區別。

普魯士學派及其流布

德意志地區的文化整合雖是先於政治整合存在，但因為宗教信仰的差別，所以德意志文化未必是整合德意志的基礎。因為 18 世紀前後，「德意志文化」與「地方文化」同時並存，無論德意志文化、普魯士文化或萊茵文化均具有特定內涵。強調地方特質的文化，往往成為「個人主義」或「地域中心論」的溫床，所以如果要以「德意志文化」作為政治統合的基礎，也可能造成負面效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強調「德意志」而設法排除「地域思想」。因此，部份學者從塑造國家意識及國家認同著手，直接鼓吹以普魯士為認同中心的學說，稱為「普魯士學派」(die Preußische Schule)。

1884 年蘭克過世之後，特來區克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0-1896)²¹ 也繼承了蘭克普魯士王室史官一職，成為「普魯士學派」的健將。這個學派強調歷史學的重要，反對歷史中有所謂的「客觀」(Objektivität)，將歷史視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企圖從共同的歷史發展過程，建立一個共同的國家意識，而隨著社會發展，教育普及，這種國家意識也灌輸給在學的學生。他的另一句名言「人類創造歷史」(Männer machen die Geschichte)，也說明了歷史的主觀價值。所以史家史萊爾 (H. Schleier) 認為：「19 世紀

20 Leopold von Ranke, Ausgewählt und bearbeitet von Hans-Joachim Schöps, *Preußische Geschichte, 1415-1871*, p. 22.

21 特萊區克曾但任《普魯士年鑑》(Jahrbücher) 雜誌的編輯，曾在 Feiburg, Kiel Heidelberg 等大學任教，亦曾任帝國議會議員，支持普魯士中心論，並積極反猶，寫過〈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幸〉(Die Juden sind unser Unglück) 一文，近來頗受譴責。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後半期一些「小德意志學派」史家成為中產階級史學的主幹，在 1850、60 年代在普魯士的領導下，在各種政治紛爭中支持德意志民族統一；1871 年以後成為普魯士—德意志的官方史學。」²²

當時主導普魯士文化事務的阿特霍夫 (Friedrich Althoff, 1839-1908)²³，也積極計畫建立「普魯士中心論」，排斥不同意見者，因而被稱做「德意志大學體系中的俾斯麥」。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便對此頗有批評。韋伯與蘭克一樣，也出生於德國中部的圖林恩，也信奉路德教派，但其任教之處均在德國西南部大學如弗萊堡 (Freiburg) 及海德堡 (Heidelberg) 等地，對普魯士保持相當距離。而他的父母均為國家自由黨 (Nationalliberale Partei) 的國會議員，本人也尊奉自由思想，晚年甚至與其他人共同成立德意志民主黨 (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根據其妻瑪麗安·韋伯 (Marianne Weber, 1870-1954) 為他寫的傳記可以知道，他對普魯士學派成為俾斯麥的「文化打手」有所批評，也認為特來區克史學的學理根據相當薄弱，強將政治價值判斷加諸受教育者，違反了學術道德及良知。

普魯士中心論一直與「新史學」結合，並在 19 世紀末期向外傳播，英格蘭的史家密其烈 (Jules Michelet, 1798-1874)、麥考萊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 均受影響，所以英格蘭史家巴特費德 (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 在討論近代史學發展時，對蘭克學派就多所著墨。

美國也受到蘭克學派的影響。根據統計，1832 到 1914 年間，約有一萬名美國學生前往德意志地區接受高等教育²⁴。1871 年以後，美國學生大多集中到柏林，他們將蘭克的理論連同普魯士中心論介紹到美國，而有所謂「新史學」的成立：除了強調方法運用外，對政治史的興趣也遠高於其他主題，直到 1930 年代才有所改變。

22 Hans Schleier, "Die kleindeutsche Schule 'Droysen, Sybel, Treitschke'", in: Joachim Streisan (hrsg),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on 1800 bis 1871* (Berlin (Ost): das europäische Buch, 1969), Bd. 1, S. 271.

23 1871 年德法戰後，亞爾薩斯及洛林兩地歸還德國，由普魯士代管，普魯士當局任命阿特霍夫參與在亞爾薩斯首府史特拉斯堡 (Straßburg) 建立一所大學，從該大學的組織及教授聘任，就可以看出其附和俾斯麥的「文化鬥爭」的企圖。1882 年以後，他更掌控普魯士的大學教育，柏林大學也急速擴充，許多人事聘任案也都根據此種普魯士中心論進行。

24 Merle Cruti, *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Vol. II, p. 567.